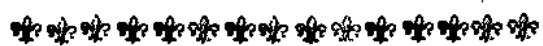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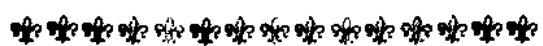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军事史学术讨论会  
论文汇编  
(四)



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



# 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述评



沈清滨 夏林根 朱学成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中国近代军事史，是中国军事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一百一十年间，中国军队建设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战争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在漫长的中国军队与战争发展长途中，近代时期的军事变迁史具有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

中国近代军事史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军队的变化发展是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反映；而战争则是国家、民族、阶级集团之间的生死搏斗。

虽然中国近代军事史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学科体系，但对它的研究却起步甚早。鸦片战争甫告结束，就出现了一批对战争失败进行反思和探讨御敌救国方案的著述。1842年9月林则徐在兰州致友人姚春木、王冬寿的信，是近代最早从军事上总结清军失败原因的文献之一，信中提出的“剿夷八字要言”是近代反侵略军事思想的最初表述。同月刊刻的魏源《圣武记》，探究了清代经制兵八旗、绿营的历史，其启四卷阐述了作者关于战守、军政、军储诸方面的见解，是近代最早一部研究清军军史、战史的著作。次年一月刊于扬州的《海国图志》，作者在《筹海篇》中以战、守、和三方面较系统地总结了鸦片战争失败教训，主张改军清王朝军队和清军调遣成法，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所以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几乎是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开端同时起步的。

自林魏以来，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迄今已有一百四十多年历史。其间可粗分为三个依次递进的时期。

从鸦片战争失败到清王朝覆灭为第一个时期，或称晚清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军事著述，多数是对各次重大战争的个案研究，以直观的过程描述为主，间或抒发了作者对战守方策的见解。著名的除上举魏源的作品外，华廷杰的《融藩始末》、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肖盛远的《事匪起事记实》、李滨的《中兴别记》、姚锡光的《东方兵事本末》等著述，都是当时人研究当代战争的成果。

这一时期论述晚清军队与军史的代表作是王闿运的《湘军志》和王定安的《湘军记》。前者成一家之言，直笔修史，不加讳饰，对曾国藩等间有讥贬，但史实记载失之过简，材料取舍也有可议之处；后者内容充实，资料丰富，对曾国藩则多溢美之辞。两书各有短长，对湘军源起、营制、俸饷、战史、谋略都都有所叙论，至今仍是研究湘军史的重要参考书。

晚清时期正是清军开始近代化建设的阶段，一批学习和介绍西方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的论著应运而生。其中，袁世凯编纂的《训练教法详细图说》，许景澄编译的《外国师船图表》，李凤苞和英国人金楷理合作翻译的《克虏伯炮说》、《行海要术》，徐建寅编写的《兵学新书》，贺忠良编撰的《战法学教科书》等，对清军近代化建设起了借鉴作用，从中也可看到西方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对中国军队的影响。

由于晚清时期的军史、战史研究深受传统史学观点和方法的局限，因此大多数著述仅是资料罗列和就事论事。不少作者虽对战争方策发表过有益的见解，提出了若干改革军事制度的主张，

往往只是经验之见，不成系统的军事理论。所以晚清时期的军事史研究，还只是积累资料的阶段。这个时期的各类军事著述，为后世研究晚清军队和战争，研究作者的军事思想与主张，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自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为第二个时期，或称民国时期。这是近代军事史研究由个案走向会通，变描述具体过程为理性探究的发端时期。1923年蒋方震发表《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一文，对清军军制的演变和装备近代化过程作了历史的探索，是民国时期较早会通研究近代军事史的学术性文章。他所著的《国防论》、《新兵制与新兵法》等书，也是融会传统军事思想与西方军事理论，对中西军队的战略战术进行比较研究的有影响的论著。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了文公直所著《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此书原拟包括军制、军史、战史、兵器、海军等五编，另有空军总论一篇，但只印出了前三编。自1895年胡燏棻小站练定武军开始，叙至作者写书的年代，而且“迺溯至我国有军之始，略述梗概”，实际上是近代最早一部陆军发展通史。全书资料丰富，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第二编《军史》部分，详细记叙了北洋军、奉军等全国各地军队的历史沿革及各军团以上部队的番号、长官姓名、驻地等项目，为后人研究民国早期军阀武装提供了较为具体的资料。

三、四十年代，军事史研究适应当时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出现了一股小小的热潮。《中国国防史略》（沈清尘著）、《咸同贵州军事史》（凌惕安撰）、《中国历代征兵制度考》（刘公任著）、《中国历代兵制概要》（秦松石著）、《中国军制史》（黄坚叔著）、《中国军事史略》（张其昀著）、《历代兵书目

表》(陆达节编)等书竞相出版。但大多著作还比较粗疏,往往流于史料的罗列和过程的叙述;就内容看,重古代轻近代,重国民党军轻其它部队,重战史轻战略战术。其中一些探述军事发展史的著作,在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军事思想与中国社会思潮的流变等方面,均未能作出深入分析。

在这股热潮中,罗尔纲所著的《湘军新志》和《绿营兵志》两书堪称力作。《湘军新志》成书于1938年6月,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不仅对湘军的组建、兵将、营制、饷章、渊源、招募及遣散、训练和选拨、战略战术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考辨,而且探索出“清季兵为将有的根源,是由于兵为将所自招,将为将帅所自择,兵随将转,兵权握将帅手中”<sup>①</sup>。这一见解,成为贯穿全书的主题。但书中对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及其评价,对湘军编制与明代戚继光编制之间的渊源关系,或有可以议之处,或未论及。1984年本书修订改题为《湘军兵志》重新出版时<sup>②</sup>,作者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绿营兵志》成书于1940年夏,直到1945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本书共三卷,上卷叙述绿营历史;中卷专述绿营兵制,包括营制、世兵制、统驭、平时任务,战时调遣等;下卷叙绿营兵政,包括铨选、军政、简阅、奖惩、俸饷、军器、马政各项。罗尔纲稽考出“绿营是行一种兵皆土著、将皆升转的制度,兵皆土著,故兵不得随将为去留,将皆升转,故将不得久管一地的兵政。绿营有兵籍,兵籍掌于兵部,全国兵数可按籍而稽。饷发于户部,不许就地自筹。兵权、饷权

① 罗尔纲:《清代兵志题记》。

② 中华书局1984年版。

均牢牢地紧握着中央。”<sup>①</sup>这两部著作，资料翔实，考证精审，叙述全面，且互为映照，系统地研究了清季军制的第一次重大转变。两书中上述主要结论，已为近代军制史的研究者普遍接受。罗尔纲另写有《晚清兵志》一书，分淮军志、甲兵练兵志、陆军志、海军志、军事教育志、兵工厂志六卷。书于1942年写成，迄今尚未刊行。以一人之力而成《清代兵志》这套学术专著，对近代军事史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

与晚清时期相比，民国时期的军事史研究在纵横两方两都有了发展。从纵向研究方面看，不仅超越了以往单纯考察各次重大战争的格局，开始注意于战争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对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过程作了大体描述；从横向方面看，举凡近代军制的演变、装备的改良、军事学校的设置、兵工厂生产、外国军事教官的活动等门类均有所涉及。但大多数研究者热衷于制度史方面的追本溯源和勾稽流变，而且只注意于上下几千年的军事变迁，没有认识近代军事史的特殊地位。所以十多种著作，除《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外，没有一部近代军事史的专著。至于英雄史观和唯武器论的泛滥，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更随处可见。

这一时期，解放区的军事史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正逐步引起重视。毛泽东所写的一系列军事论著，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总结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对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建设有重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我国的历史遗产加以批判总结的号召；同

<sup>①</sup> 罗尔纲：《活代兵志题记》。

年，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又号召全党注意研究军事问题。正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视下，1939年延安八路军总部出版了《军政杂志》，加强了对人民军队发展史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总结和描述红军军史、战史以及研讨人民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群众工作和战略战术的文章。朱德、刘伯承、叶剑英、陈毅等人撰写的关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进行军事斗争的总结、报告和论文，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史的重要文献。

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是在第三个时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三十多年来，已出版了近代军事史专著、资料、战争回忆录等百余种，论文和各类资料性文章、回忆录近五千篇。这些著述，涉及军事制度、军事思想、战略战术、战役战斗、兵器装备、后勤供给、教育训练、近代海军、军事人物等方面。因此，本文着重对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进行评述。

## 二

建国以来，近代军事史研究从总体上说还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而是结合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展开的。由于学术界习惯上把这一百一十年历史以五四运动为界标，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三十年两大时期，因而，中国近代军事史也自然被分割为两部分进行研究。

自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八十年间的军事史，建国以来随着近代史研究的日趋深入，不少问题被提出来加以研究和讨论，其中关于军事制度、军事斗争、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四个方面的研究

尤为集中，史学界发表了大量的专题研究论文。

关于军事制度的研究，学术界较多地注意晚清军制演变过程中的两个转折，即从八旗、绿营经制兵到湘淮军的兴起和从旧式陆军向新式陆军的过渡。在第一个转折的研究中，对团练及其与湘军产生的关系，不同看法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首先是团练的性质与作用问题。曹国社在《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团练的组织及其反动性》<sup>①</sup>一文中，认为团练是清政府一贯用来镇压人民的反动地主武装，终晚清数十年，团练仍是地主阶级的工具。何若钩也有类似见解，但表述略有不同。他认为团练从来就是地主阶级的地方武装，有防内寇与御外侮两方面的作用，但它的地主阶级属性并不因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不可能领导人民进行反侵略斗争<sup>②</sup>。夏林根的看法不同。他在《近代团练问题研究》<sup>③</sup>一文中认为，近代团练作为地主阶级地方自卫武装，参与了镇压人民起义、维护了反动统治秩序；但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团练也有参加反侵略斗争的事实。由于团练武装给豪绅土霸提供了扩张个人势力的机会，不利于中央的集权统治，所以清政府对团练既有利用之意，也有防范之心。

其次是团练与湘军产生的关系问题。解放前的一些论著，认

① 《史学月刊》1964年第11期。

② 《团练的阶级属性和它在近代反侵略斗争中的地位》，《华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

③ 《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为湘军就是湖南的团练，后来扩编而成湘军①；有的论者则称湘军就是“民兵”，曾国藩编练湘军是“书生用民兵以立殊勋”②。解放后出版的若干近代史著作，也沿袭湘军即团练之说。如戴逸在《中国近代史稿》中认为：“曾国藩所创办的团练不仅打着清王朝的招牌，更重要的是他重视一向未被清朝重视的汉族地方性封建势力的作用，扩大和加强汉族地方地主的权力，把各地的封建势力联络一起，因而这种团练形成一支有深厚基础的最凶恶的反革命武装。”③；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中，也把湘军和各地团练并列④。尹福庭对此有不同意见。他承认曾国藩办湖南团练与湘军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曾国藩是把罗泽南的湘乡团丁加以改组扩大，募勇办练，创立一支新军；但曾国藩办团练与编练湘军是同时进行的，不存在先后，更不能说湘军是团练发展而来的⑤。罗尔纲则明确指出“湘军非团练”，曾国藩是个极力反对团练的人，他在举旨办理团练之初，一开始就撇开团练不谈，而坚决地立即就创立新军⑥。

① 参阅王闿运：《湘军志》；薛福成：《海外文编》卷四。

② 蒋方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见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

③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6—267页。

④ 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5—36页。

⑤ 尹福庭：《湘军的产生与曾国藩办团练的关系》，《历史教学》1981年第8期。

⑥ 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3—44页。

上述研究对弄清近代团练的性质、作用及其与湘军产生的关系是有意义的。但若把团练作为晚清军制演变的一个中间环节，研究它在清代军队从国家化向私家化转变的过程中究竟起了何种作用与影响，无疑将更有意义。

在关于第二个转折的研究中，陈旭麓、劳绍华合写的《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sup>①</sup>一文较有代表性。文章概述了清朝兵制改革的三个重要过程，对新军的产生、扩编及其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分别作了论述。作者认为新军的创立是清政府“在洋务运动后向西方学习的一个方面”，目的是想以资本主义的新事物来维持封建旧统治，这本身就构成了难以克服的矛盾，而给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以可乘之机。这些观点，后来已为近代史研究者广泛采用。

陈崇桥在《一八六〇年清代陆军军制的演变》<sup>②</sup>一文中，主张以甲午战争为界标，把这一时期的军制演变分为两个阶段，指出由于清王朝经济落后，政治腐朽，军制改革的收效甚微。陈文桂的《论清末新军向革命转化》<sup>③</sup>，通过各省新军向革命转化的具体史实考察，论述了转化的内在根据和革命派所做的艰苦工作，使新军发生了性质的变化。

对于反政府的武装组织，研究较多的是太平军军制和捻军军制。前者以邱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增订本）<sup>④</sup>中有关太平军军制部分的论述较为具体详实。作者在罗尔纲研究的基础上

① 《学术月刊》1961年第4期。

② 《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③ 《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④ 中华书局1963年版

有所发展，在军队编制方面，缕述了太平军初起时以地域编军到后来不分地域混合编军的过程；在军队官制方面，理析出太平军分军内正职官、军内杂职主官和杂职属官三级体制。作者长于分析排比资料，善于从不同记载中发现问题，书中的注译也多有考订辨误。后者以江地的有关论文为代表，这些文章都已收入作者的《捻军史论丛》一书中。

三十多年来，学术界对鸦片战争之后八十年间的各次重大战争都分别进行了研究。虽然不少文章还停留在描述战争过程的水平上，但已经出现了若干新的研究趋向和有一定深度的论著。

新的研究趋向的一个表现是，充分利用和发掘新资料，特别是有关外文资料，或选择小中见大的题目作突破性研究，或对一场战争进行系统考察，形成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著。前者如茅海建的《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sup>①</sup>一文，利用中外记载，对双方的兵力作了详细具体的统计分析，说明总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清军，每次战役却只能投入其总兵力中的极小一部分，因而处于劣势，这种状况，“正展示了落后的封建性军队同近代化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军队之间的巨大差别。我们在探索清军如何丧失兵力上的优势时，可以看出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和落后的封建经济正是最终的根源。”李平子的《半岛海战》<sup>②</sup>利用盛宣怀未刊档案，参以西文、日文资料，对战争的爆发、经过、影响作了详细、谨慎的叙述和分析，通过史实，纠正了历来认为日舰进入丰岛海面是为了阻止“高升”号运送中国军队增援牙山，“高升”号事件是甲午战争开始的说法；并对方伯谦的评价提出了商榷性意见。

① 《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② 《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

后者如孙克复、关捷合著的《中日甲午海战史》、《中日甲午陆战史》<sup>①</sup>以及戚其章所著的《威海卫之战》<sup>②</sup>等书。前二书，作者分别从海、陆两个战场叙述了中日交战的过程，探讨了清政府战败的军事上的原因，书中对黄海大海战双方舰队的队形作了详细考察，对清军在陆战中的战略方针及其战术战斗提出了新解。全书征引了百余种外文资料，不少是以前未曾利用过的。后一种是研究威海卫之战的专著，书中有不少是作者访问当年参战老人所得的口碑资料。这些著作对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此外，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邝纯著《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多卷本，虽然使用常见的资料，是一部太平军战史资料长编。但由于作者多方搜罗，详加排比，对研究者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书中不少考证，纠谬辨讹，颇见功力。

这种新的研究趋向还表现为普遍加强了战略战术的分析和检讨，从而使对战争过程中的研究开始从具体描述逐渐上升为理论性分析研究。如关于太平天国战争的研究，从七十年代后期起开始由一般地讨论天京建都是否战略错误<sup>③</sup>，发展为全面探讨太平

---

① 《中日甲午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日甲午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威海卫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参见茅家琦、方之光：《太平天国建都天京战略上的重大错误吗？》，1963年7月9日《文汇报》；牟安世：《论太平天国建都天京》，1963年7月25日《文汇报》。

天国的战略方针问题。王庆成在1978年《历史研究》第6期上发表了《太平天国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一文，认为太平军进入湖南时就存在关于战略目标的争论，直到攻占武昌后才确立“专意金陵”的战略方针，但洪秀全并未放弃“取河南为业”的思想。建都金陵后，太平天国不能不受争夺南中国的制约，“保守性是明显的”。因此，这是一个错误的战略指导方针。张一文看法不同。他在《太平天国前期战争的战略问题》<sup>①</sup>中认为，太平军“专意金陵”、定都立业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只是在建都后丢下江南、江北大营不打，而同时进行北伐、西征，才是战略上犯了大错误。

关于太平天国后期战争的战略问题，张一文认为，从天京事变到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太平军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1860年秋开始的第二次西征，是后期战争的成败关键，太平军的“最佳方略”如果把战略打击目标选在祁门曾国藩大营而不是选在武昌，就有可能夺回战争主动权，改变整个后期战争的面貌与进程。李秀成撤离武昌后紧接着进攻上海，又造成了战略失误，它不仅加速了安庆的陷落，而且使整个军事形势急剧恶化。在无法打破湘军对南京的包围时，“让城别走”是太平天国当时的唯一出路。<sup>②</sup>

沈渭滨在1982年《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了《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战役研究》，认为从战略全局看，太平军真正对手不是江南大营的清军，而是围困安庆的湘楚军。太平军把注意力集中

① 《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

② 张一文：《太平天国后期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在江南大营上，实际上是天京事变后保守思想在军事上的反映；为了进行二破江南大营战役而不适当地调西线主力东进，种下了安庆失守的祸根。尤其是这次战役作出了东征苏常、上海，然后西取武昌的错误决策，结果，“江浙的军事胜利反加速了南京的陷落。”很明显，沈文虽也认为太平军后期战略的重点应在西线，但并不认为二破江南大营在后期战略全局上是正确的。

苑书义不同意张一文关于太平军“最佳方略”在于攻打祁门之说。他认为若能坚决执行“合取湖北”的原定方略，就可威胁湘楚军的根本，踞虚而入并迫使湘军回救，从而削弱围困安庆的兵力<sup>①</sup>。苑书义与张一文虽都认为解救安庆是重要的，但对应否进攻武昌的方略，看法大相径庭。

关于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接敌阵形的得失，一些研究者则从战术角度进行了探索。郭游认为，北洋舰队发现敌舰前是编成双纵队前进，发现后则编为后翼梯阵向敌接近这两种阵形都是正确的；但双方进入炮火激战阶段仍采用后翼梯阵，则不能发挥舰队全部力量，失去了编队的自由机动能力，使整个舰队处于被动地位。<sup>②</sup>吴如满则认为，接敌前北洋舰队是以单纵队航行，接敌时改为夹缝雁行阵<sup>③</sup>，而实际上由于指挥错误呈不规则的半月形。

① 苑书义：《评太平军二次西征的“最佳方略”》，《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② 《黄海大海战中北洋舰队的队形是否正确》，《文史哲》1957年第10期。

③ 《谈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江苏师院学报》1979年第1、2期。

若按议定的双纵队阵形，较之实际接战的夹缝雁行阵，不仅机动性强，易于指挥，而且较有利于发扬舰队火力①。

戚其章、孙克复、关捷考证北洋舰队阵形，认为接敌前是倚角鱼贯小队阵，或称夹缝鱼贯小队形；接敌时曾变换队形，旗舰变阵令旗是夹缝雁行小队阵，而实际队形是並不严格的后翼梯阵，或称人字阵、楔阵、燕翼阵；开始作战时为锐角长人字阵，后来变为钝角的扁人字阵，但始终未成为夹缝雁行阵②。

孙克复认为关键在于不应将不同舰种、不同舰速的军舰混合编队。如果把致远、靖远等巡洋舰单独编队，把整个舰队编为两个作战梯队，不仅可以发挥巡洋舰的机动突击作用，而且舰队阵形跨度大为缩小，两翼的弱舰得到主力舰侧舷炮火的有效支援和掩护。当敌舰攻击其中一个梯队时，另一个梯队可以迂迴敌后进行反包围，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使敌舰腹背受敌。这样，黄海大海战的结局当可大为改观③。

由黄海海战的讨论，进而引起了北洋海军的评价问题。早在1957年，郭毅生、冯池安在《文史哲》第6期上发表《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不仅对北洋舰队的阵形作了探讨，

---

① 《略谈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的议定队形》，《江苏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

② 《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阵形考》，《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③ 《甲午黄海大战北洋舰队阵形的得失》，《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

而且提出了应该重新评价北洋海军的意见。他们认为北洋海军广大将士在海战中英勇顽强；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没有失败，甚至可以说获得小胜，至少是胜负不分。这个新见，对传统观点认为北洋海军致败之由在于训练废弛、军纪败坏、不堪一击的说法，提出了挑战。经过学术界二十多年来对北洋海军的深入研究，郭毅生等人的说法得到不少学者响应。戚其章在《北洋舰队》一书中主张，对北洋舰队广大将士的评价，要同对李鸿章的评价区分开；孙克复、关捷在《甲午中日海战史》中也认为，北洋海军不论在战阵训练和军事技术方面，都称得起是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近代海军，把海战失利归咎于北洋舰队的“腐朽”，是片面夸大了北洋舰队的阴暗面。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清武装起义战略的讨论，是近几年中提出的。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些起义是单纯的军事冒险。近年来有人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战略方针概括为：利用会党、策反新军、雄踞一省然后挥师北伐的战略速决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起义具有城市暴动式军事冒险的特点①。

金冲及在《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二题》②一文中认为，同盟会在组织武装起义中最费斟酌的两个问题是起义地点和依靠力量的问题。他认为在最初几年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粤桂滇边境，应该说是正确的，甚至到1910年初还很难说是错误。革命派的缺点是没有清醒地对全局作出准确判断和灵活反映，对广州作为

---

① 夏林根：《论资产阶级革命派反清武装起义的战略方针》，《复旦学报》1981年第5期。

② 《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